

● 文学研究

## 隔空对话: 纳博科夫文化身份论与 巴巴杂糅理论<sup>\* 1</sup>

汪小玲 徐千惠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上海 200083)

**提 要:** 纳博科夫的文学作品中凝结着对后现代文化身份的潜心考量, 形成独特的文化身份论。本文以《普宁》为例, 通过将纳博科夫文化身份思想中的可改写性、多元渗透性、流动发展性与霍米·巴巴杂糅理论中的“协商”、“杂糅”和“文化差异”<sup>3</sup> 三个概念并置考察, 探寻两位大师在文化身份意义上的隔空对话与精神投契, 论证纳博科夫文化身份论的前瞻性与先锋性。

**关键词:** 纳博科夫; 巴巴; 文化身份; 杂糅 《普宁》

中图分类号: I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6)05-0145-4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16.05.036

### A Dialogue Between Nabokov's View on Cultural Identity and Bhabha's Theory of Hybridity

Wang Xiao-ling Xu Qian-hui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ina)

Postmodern cultural identity, which is condensed in Nabokov's literary works, has developed into his distinct view on cultural identity. This paper takes *Pnin* as example, by comparing the rewritability, diverse permeability, and developability in Nabokov's view on cultural identity with "negotiation", "hybridity", and "cultural difference" in Homi K. Bhabha's theory of hybridity, aims to explore the dialogue between two masters in terms of cultural identity, thus demonstrating Nabokov's forward-looking and pioneering view on cultural identity.

**Key words:** Nabokov; Bhabha; cultural identity; hybridity; *Pnin*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 Nabokov, 1899-1977)是20世纪重要的文学家、黑色幽默小说家。在1964年1月发表在《花花公子》的一篇访谈里, 纳博科夫曾透露自身的民族身份意识“我是一个美国作家, 出生在俄国……1940年我来到美国, 决定成为一个美国公民, 让美国成为我的家……我是三分之一的美国人”(纳博科夫2012: 27)。在另一篇BBC电视台(1962)的访谈录中, 纳博科夫同样提到“在美国, 我心智上有回家的感觉。美国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二故乡”(同上: 10)。纳博科夫对自身俄裔身份及美国文化身份的双重肯定体现出他一种多元文化的身份认同观。这种身份论不仅体现在他的访谈

录中, 他的文学作品中更是凝结着他对后现代文化身份的深刻思考。纳博科夫的文化身份思想源于他童年多语言的教育环境、流亡生涯背景下多元文化的刺激体验与跨语言的文学写作与翻译经历。他从小受到英、法、俄等多语言的熏陶, 习惯转换于不同的语言国度, 可以说是“头脑讲英语”, “心灵讲俄语”, “耳朵讲法语”(同上: 50)。从1919年离开俄国故土到1977年于瑞士过世, 纳博科夫辗转于欧洲各国及美洲大陆, 穿梭于异国多元文化, 这一特殊经历与深刻的流亡意识为纳博科夫文化身份思想提供重要依据, 加之多语言的文学写作与翻译经验带来的深刻体悟, 纳博科夫的文化身份论在他的文学

\* 本文系上海市曙光计划项目“纳博科夫文艺理论研究”(11SG32)的阶段性成果。

作品中逐渐勾勒成形,并自成体系。他独特的后现代身份论涵盖文化身份的可改写性、多元渗透性、流动发展性和世界包容性等特征,表达出对静态、单一、本质的传统身份观的早期质疑,折射出重要的前瞻意义。这些都使他与后世理论批评家霍米·巴巴的隔空对话成为可能。

20世纪80年代,霍米·巴巴(H. Bhabha, 1949 - )正式提出杂糅身份理论。这一文化身份理论包涵“模拟”(mimicry)、“协商”(negotiation)、“杂糅”(hybridity)、“文化差异”(cultural difference)和“第三空间”(third space)等重要概念。巴巴认为,“既然民族的‘混杂性’不可避免,文化上的身份和认同也不例外”(王宁 2002: 40),因此,他“拒绝一种始源性的、稳固的民族/文化的身份认同,而宁肯选择一种矛盾的、协商的和演现式的双重身份”(生安锋 2011: 94 - 95)。纳博科夫的研究成果表明,他的文化身份思想与巴巴的杂糅身份理论颇具相通之处,后者的3个重要概念在前者文化身份论中均有迹可循。因此,从文化身份的角度比较研究纳博科夫和巴巴,探寻两位大师的隔空对话与思想共鸣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纳博科夫后期作品《普宁》为例,并比较其文化身份思想中的可改写性、多元渗透性、流动发展性与巴巴杂糅身份理论中的“协商”、“杂糅”和“文化差异”,揭示纳博科夫文化身份思想与巴巴杂糅理论的一致与共鸣,通过考察两位大师的思想交汇与视域融合,领悟纳博科夫文化身份思想的前瞻性与先锋性。

### 1 文化身份的可改写性与“协商”

在文化身份这一概念的界定上,西方建构出的自我与他者二元对立的静态身份认同可谓其欧洲中心主义传统价值体系的衍生产物。可见,这种带有欧洲中心色彩的二元对立身份观的确立是建立在对他人身份否定的基础上。巴巴以“协商”置换“否定”,强调文化身份边界之间的游离、协商与妥协,是对西方传统静态的自我与他者对立身份观的扣问与颠覆。与巴巴的“协商”概念不谋而合,纳博科夫在《普宁》中也传达出他的文化身份意识——文化身份具可改写性。在他的小说中,文化身份的界定与区分不再以一条明晰固定的界限为划分标尺,而成为一个重复协商且可改写的建构过程。

首先,在纳博科夫的小说中,他者被赋予身份改写的的话语权,并以能动性置换他者对主流文化接受过程中的被动性。他的身份论表明,他者对主流文化的接受不可能呈现纯粹本质的特征,他者本身的文化色彩难免导致对主流文化的“误读”,而他者的“误读”正是书写其身份改写权的起点。在《普宁》中,他者对主流文化最典型的“误读”则表现为“可笑”、“混杂”的普宁式口音:“如果说他的俄语是音乐,他的英语可是谋杀。他在去掉腭音这方面遇到很大的困难(普宁把‘困难’念成 dzeefecoolt-

see) 绝对没法去掉 t 和 d 这两个字母额外的俄语水分,后面跟着的元音他总发十分古怪的软音”(纳博科夫 1981: 66 - 67)。

从这一段不难看出,普宁对美国口音的模仿不可避免地把自己的俄罗斯元素掺杂进来,完全无法去掉“额外的俄语水分”(同上: 66)。普宁俄国口音对地道美式英语的扭曲变形正是他者对主流文化的“误读”。语音作为文化主流身份在场的能指,遭受着他者的侵犯与践踏,这正是他者身份改写权的最高表征:文化他者被赋予身份书写的能动性,使得原本纯粹的美式口音被普宁扭曲变形后听起来“完全象意大利语”,令人啼笑皆非(同上: 67)。

其次,他者对主流文化的任意改写在让人无可奈何之时,更给文化主体带来未尝预料的烦恼与恐慌。“蒋(琼)我在找威士枯斯和苏大斯特”,他凄凉地说:“我怕没有苏打水”,她带着盎格鲁-撒克逊人那种清醒的克制力回答道。(同上: 58)不难看出,此处普宁把“琼”这个称呼念成“蒋”;他其实想找威士忌苏打,但念成 viscous and sawdust,原意被普宁奇特的发音扭曲为“粘胶和锯末儿”。这对作为美国主流文化体系代表的琼而言,显然造成难以名状的别扭感与烦恼。仔细分析可以看出,琼其实希望纠正普宁式令人难以忍受的蹩脚发音,但烦恼与难耐之下,她似乎又不得不保持她那份“清醒的克制力”,以便对话能继续在友好的氛围中维持。在此,语音作为纯粹本质的主流文化的在场,似乎面临着来自他者难以摆脱的威胁,而这份威胁更明显地体现在普宁对人类学教授特·维·托马斯的重命名上:“我现在真闹不明白他干嘛那样称呼我”,人类学教授特·维·托马斯对克莱门茨夫妇说,他们正一块儿穿过黑暗,朝4辆停在马路对面榆树下面的汽车走去。“我们这位朋友”,克莱门茨答道,“有他自己一套命名的方法。他嘴里变化无穷,给生活增添了乐趣。他把字音念错,神奇得跟神话一般。他即使说溜了嘴,也是深奥难解的。他管内人叫蒋。”“可我还是觉得有点别扭”,托马斯说。(同上: 176 - 177)

可见,普宁非但没有以美国文化惯有的方式称呼托马斯,反而冠之以自己的命名方式。普宁念错字音、自主命名,两种实践行为皆表征他者在文化碰撞过程中对主流文化的扭曲与变形。表面上,普宁对主流文化的误读与变形给琼及托马斯带来困扰,实然这种困扰是文化主体自身在他者身份书写能动性的阴影笼罩下产生的一种身份焦虑:从某种意义上,原本高贵本质的主流文化被扭曲捏造为不堪入目的文化杂种,文化主体已经难以辨别到底他者是受到同化使然还是在对自我主体身份进行恶意的嘲讽与戏仿。身份焦虑的背后折射出主体身份权威性 & 本真性的永久缺失。也就是说,主流文化价值体系建构的自我与他者身份的二元对立并非坚不可摧。一方面,文化同化宣告强势主流文化的胜利;另一方面,同化

过程中,外来文化对主流文化构成一种改写与变形,其产生的“杂糅”效果导致主流文化的身份焦虑,暴露强势文化体系下自我与他者身份划分的二元对立思维盲区。由此,他者与主流文化身份的关系由被动的接受效仿颠覆为能动的改写变形——主流文化身份不再原封不动地被他人照搬复制,身份的边界被不断移动、擦除、重写,并由静止、本质的稳定状态转化为不断改写的过程。

在此意义上,纳博科夫可改写性的文化身份论与巴巴的“协商”都质疑与抵抗单一、对立身份观,二者彼此唱和、相互通融。

## 2 文化身份的多元渗透性与“杂糅”

巴巴杂糅性身份理论的另一重要概念便是“杂糅”。巴巴认为,文化身份之间并非相互排斥、分离,而是在交流碰撞过程中相互掺杂甚至交融。在他看来,即使是“模拟”这一强化规训力量、渗透宗主国价值观念认同的文化同化策略,也无不体现出“杂糅”的特征。在“模拟与人: 殖民主义话语的情感矛盾”一文中,巴巴指出,“模拟”同样具有片面性,“殖民主义的模拟体现(殖民者)塑造一个被改造但依然可辨认的他者的欲望,这个被改造后的他者作为一个差异的主体,要与殖民者大体相同,却又不能完全相同”(Bhabha 1994: 86)。换句话说,殖民者既驯服他者,又肯定其差异,意在将模拟或同化限制在安全阈值内,使得殖民者的他者形象依然明晰可辨,以规避高度同化对自身规训地位的冲击与威胁。这种殖民主义体系的模拟的片面性与模拟过程中他者对权威文化的异化改写一起产生惊人的颠覆效果。“模拟”也演变成一种文化杂糅。可以看出,巴巴意在通过“杂糅”概念强调文化身份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状态。这种观念在纳博科夫的作品中同样可以得到呼应: 在文化身份的可改写性这一观念下隐含纳博科夫更深层次的杂糅意识,即文化身份的多元互渗性。纳博科夫认为,文化身份的界定既然具有可改写性,在身份重新书写的过程中则定会染上其他文化的印迹,任何文化身份不再是同一本质的静态产物,而成为多元文化相互渗透的阶段结果。

在《普宁》中,文化身份多元互渗性首先体现在普宁交替反复的语体转换行为上:“您向我打听云雀,俄文里是 zhavoronok,我感到很荣幸,先生,我得向您汇报一下这方面的情况……现在我想咱们可以挪步到另外一间屋里去啦,一顿 à la fourchette 晚餐正在等着咱们呐!”(纳博科夫 1981: 167) 此处 à la fourchette 是法语,自助式的意思。可见,选段中呈现出普宁在俄、法、英 3 种语言之间的语体转换。语体转换与身份认同是一对隐喻关系。在上述选段中可以看出,普宁并未表现出对他国文化的拒斥及对俄国文化的单一保留,而选择 3 种语言的混用,彰显对 3 国文化的认同及其多重文化身份相互渗透的意识倾向。

除交替的语体转换行为,《普宁》中表现文化身份多元互渗性的最显著也最易被忽视的标志是跨国婚姻。对婚姻的构想是一种对家庭的渴望,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与社会文化关联的基本指向。跨国婚姻的特殊性决定其关联配偶各方的异域文化,表征个体对配偶异国文化的认可及多元共存的身份认同取向。小说中出现多组跨国婚姻的书写,如俄国后裔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娶了金发姑娘苏珊·马歇尔、俄裔丽莎·包果列波夫正打算嫁给的第三任丈夫——美国人邱尔契,她的第二任丈夫埃里克·温德是德国人,而温德曾在南美有个老婆……这样的跨国婚姻在小说中并非个案,书中散落多处对跨国婚姻的描写表明纳博科夫多元互渗的文化身份论已浸染于他笔墨下的字里行间。

综上所述,小说中人物的语体转换行为、各国语言间交错渗透的关联以及跨国婚姻书写彰显出纳博科夫多元渗透共存的文化身份论。这种多元渗透的身份论颇具后现代特性,是纳博科夫杂糅身份意识的核心,也是两位大师思想交汇与视域融合的最高体现。

## 3 文化身份的流动发展性与“文化差异”

巴巴在“杂糅”概念的基础上提出的“文化差异”的观点明显受到德里达“延异”思想的影响。巴巴提出的“文化差异”是抵抗、区分“文化多元”倡导的文化分离和文化僵化的状态。他认为,文化身份的自我定义一定依赖于和他者的差异关系,身份犹如语言符号,成为一种自我参照的系统,互为“踪迹”。他通过“文化差异”的概念,解构本质同一性的身份内核,强调文化身份所处的不断转译、挪用、改写的动态与波动过程。这一观念与纳博科夫流动发展性的文化身份论十分契合: 纳博科夫文化身份论认为,文化身份边界在可改写性的基础上相互渗透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平衡阶段,但并非意味着文化身份的恒定性,否则,文化身份又回到静态、同一、本质的原点。文化身份在文化互渗、交融的作用下不断吸纳新的文化沉淀,由一种身份状态推向另一种状态,实现文化身份无止境的流动与发展。作为一个动态变化的系统,文化身份在其他身份系统的互渗影响下发生调整改变,实现新旧文化身份的无限转换更替,其静止性就此打破,成为一个流动发展的动态循环。在《普宁》中,文化身份的流动发展性具体表现为他者身份认同的改变、主流文化身份的变化及散居后裔文化身份的转向 3 个方面。

第一,他者身份认同的改变是文化身份流动发展性在《普宁》中最典型的症候,具体表现为普宁对美国主流文化的身份认同。语言习得、生活方式的改变、“家”在心理层次上的变化表达普宁进驻主流文化的愿望,勾勒出他对主流文化身份由效仿、接纳到认同的变化轨迹。首先,在美国主流文化价值体系主导的社会空间中,语言习

得成为进驻主流文化的扣门砖。字典是效仿主流文化的指向,它与鞋橛子和苹果“这类必不可少的东西”(同上:10)一样,成为普宁生存的基本保障,而语言习得的惊人速度传达他对主流身份的积极效仿:普宁的英语“以惊人的速度提高,词汇越来越丰富”(同上:36),不仅如此,普宁后期甚至已经“觉得自己够资格纠正考玛洛夫在话语里经常插入的英语句子”(同上:73)。其次,生活方式的改变表征普宁从效仿到接受的过渡。普宁吃炒小牛肉片、学开车,是对美国主流饮食文化与汽车文化的接纳与融入,是对“新祖国美国的一大让步”,正如其所说的那样,“奇妙的美国有时叫我惊讶,但总是激起尊敬”,饮食及出行方式的改变表达出普宁对美国主流文化的态度由功利主义的效仿转为主观意识上的接受与尊重(同上:110)。再次,“家”的意义在心理层次上变化映射身份立场的变化,表达对美国文化的认同。“家”是安定与归属的隐喻。普宁最终决定结束常年居无定所的漂泊,计划“买下这所理想的房子”(同上:178),心理层面上“家”的变化影射出他对美国主流文化从接纳、尊重到肯定和认同的身份转向,是为漂浮无根的流散身份找寻一份安宁与归宿。

第二,主流文化身份认同的变化是文化身份流动发展性的另一显著特征。《普宁》中最明显的表现是主流文化身份对普宁俄裔身份态度的认同转变。语言和行为方式是文化身份的能指,他者文化渗透下主体语言和行为方式的改变表明对他者身份的尊重与认同。字典作为戏剧性的讽喻,在整部小说中具有颠覆性的效果:小说以普宁随身携带字典的场景开头,以劳伦斯教授参加晚宴时手边的《英俄—俄英袖珍辞典》结尾,充分展现劳伦斯教授对普宁俄裔身份态度的全然转变。

第三,文化身份的流动发展性更体现在散居后裔文化身份的转向。散居者的文化身份在继承中会不断发展更新,甚至发生改变。文化身份的流动特性决定文化身份将在与异域文化碰撞交流过程中重新定位,这种重新定位可能是对祖辈文化身份的继承发展,甚至是对传统身份走向的完全偏离:有些父母带来子女——他们都是进大学那个岁数的美国孩子,健康、高大、懒散、别别扭扭、不懂情理、不会俄语,对父辈们的背景和经历不管有什么优越之处一概不感兴趣……(他们)对一个很有意思的俄国笑话或者一句关切的劝告做出敷衍了事的反应,然后就跑开了,总是保持超然冷漠的态度;他们宁愿吃昂克维多店铺里的食物,任何罐头食品,而库克尼科夫家在

挂帘子的走廊上大摆又长又热闹的筵席,端上来的俄式美味佳肴反倒不对他们的胃口(同上:125)。可以看出,美国主流文化对俄裔后代子女的高度渗透作用产生令人惊叹的效果:后代子女对自身传统文化不仅“总是保持超然冷漠的态度”(同上:125),反而对主流文化身份表现出强烈的肯定与认同,这与传统俄裔身份背道而驰,彰显文化身份在文化碰撞中呈现的巨大的流动与发展空间,文化身份的流动发展性一目了然。

巴巴的杂糅性身份理论在纳博科夫的文化身份论中已有痕迹。纳博科夫多元渗透的后现代身份论与巴巴的杂糅性理论的一致性体现出两位大师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与思想投契。文化身份的可改写性是纳博科夫文化身份思想的萌芽;文化身份的多元渗透性对应纳博科夫文化身份思想的精髓与核心;文化身份的流动发展性可谓多元渗透性基础上对纳博科夫文化身份思想的延续与升华。这3层特征分别与巴巴的“协商”、“杂糅”和“文化差异”3个概念契合,足以彰显纳博科夫文化身份意识的前瞻性与先锋性。当然,霍米·巴巴杂糅身份理论与纳博科夫杂糅身份意识的互动与对话并未止步于二者的相似意义。巴巴在“第三空间”概念中强调的重新赋意、阐释的空间互动,是对纳博科夫文化身份可改写性在空间层面上的延展与引申。如果说纳博科夫的文化身份思想仍局限于流亡身份的领域,那么巴巴则把杂糅理论应用拓宽到殖民主义语境下的殖民文化身份认同,甚至在后期普及到少数族裔、阶级和性别等一切边缘群体的文化权利问题,将杂糅身份理论发扬成为一个具有普适价值意义的理论系统。这是对纳博科夫文化身份思想的进一步推动与发展,使纳博科夫文艺思想在历史舞台上依旧熠熠生辉,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 参考文献

- 纳博科夫. 普宁[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1.
- 纳博科夫. 独抒己见[M].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2.
- 生安锋. 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 王宁. 霍米·巴巴和他的后殖民批评理论[J]. 南方文坛, 2002(6).
- Bhabha, H. 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M]. London: Routledge, 1994.